



黑水城所出 TK261V 号文书 《寔庸献蝇拂子启》考释

毛永娟

摘要：本文首次对《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所收录的 TK261V 号文书《寔庸献蝇拂子启》进行了考释，对文书的书写时间进行了判定，文中认为此件文书虽然内容简短，但是其特殊的利用方式和书写格式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文书制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黑城；TK261 号文书；考释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4 册第 330 页有一件文书图版，编号为“TK261V”，此件文书为俄藏编号 TK261 号文书金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文书的背面所书。此书第 6 册后附的《附录·叙录》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的题解中有对此件文书的介绍，指出本件文书原拟题为《寔庸献蝇拂子启》，“共 5 行，行 7 字。楷书，墨色中。与正面文字成经纬状。”《寔庸献蝇拂子启》这件文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迄今未见专文研究，故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件文书作如下考释。为研究方便，现参照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规则，重新标点，逐录如下：

1. 寔庸敬献
2. 结织蝇拂
3. 子一把，伏乞
4. 国公、平章大人钧座
5. 笑 留 为 妙。

一、关于文书内容的说明

此件文书的录文字数较少，共 25 字，内容简单明了，容易理解。此件文书包括两个人物，一个是文书的书写者寔庸，另一个是文书的呈送对象国公、平章大人，主要内容是说寔庸向国公、平章大人敬献礼物（即蝇拂子）一事。

本件文书存留的方式，是作为 TK261 号金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文书的背面写本保存下来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 册《附录·叙录》对《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的题解为：“金刻本。经摺装。白楮纸。共 1 面。上部被裁去。残高 12.9，面宽 9.7。地脚 3.2。面 9 行，行存 11 字。下单边。宋体，墨色中。首尾缺。”从题解中所描述的文书长宽数量上，可

知此件文书面积不大，比较短小。笔者对照图版，发现此件文书四边整齐规则，成直角，状同一个长方形图形。文书左上角和右下角部分虽有较小的残痕，但并不影响文书内容。上页边距即页面边离文字的距离有半个字大小的空白行，可知录文中的第4行的“国”字和第5行的“笑”字即是此件文书的头字，上面不会再书写文字。另外，文书的文字集中在右下角和中间部分，字体间书写宽松，行距大，排列较为规则，左右两边有很大的空白区域，可知此件文书内容比较完整，不缺少文字。通过以上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总结出此件文书的三个特征：一是形状短小，二是内容完整，三是具有其特定的书写格式。

如上所说，《窆庸献蝇拂子启》是TK261号文书金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的背面写本，通过对照图版，笔者发现《窆庸献蝇拂子启》这件文书的形制比较特殊，推断是利用工具整齐地将四边裁减下来后用于书写文字的。从图版可以看出金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这面文书，其录文第三行的头字上有明显的残笔痕迹，且从《窆庸献蝇拂子启》文书这面看，文书四边整齐、平正，也可以判断出文书《窆庸献结织蝇拂子启》的原纸是被故意裁剪下来以便书写文字的。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出，文书原纸首先是被用来印佛经，然后被二次利用来书写文字的，即此件文书的形成时间应晚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的形成时间，这也是此件文书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文书录文第2、3行的“结织蝇拂子”，顾名思义蝇拂子即蝇拂，又称拂尘、纓拂、尘拂子、拄拂子、蝇甩子和蝇帚儿等，用来掸除尘土，后专指掸尘土、驱蚊蝇的用具。蝇拂子一物在古代使用普遍，常见于史籍，如：《南史·陈显达传》：“凡奢侈者鲜有不败，尘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逐。”^①唐李亢《独异志·刘裕不忘贫贱》：“宋刘裕贫贱时，尝盖布被，用牛尾作蝇拂子。及登极，亦不弃之。”关于此器具的发明原因、具体构成和使用方法，记载比较详细的是郭雨桥在《郭氏蒙古通》中的一段话：

夏天骑马提在手里，驱赶蓝头瞎虻。这种瞎虻专叮牛马，叮了以后就狂奔乱跑，无法驾驭，所以就发明了这种东西。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一条整牛尾巴，比较简陋。一种用藤条作柄（比马棒短得多），再用黑白二色的马鬃毛编出锯齿、鳞纹、十字等图案，套在柄上。下面再织出一个网络式的东西，将马尾套进去，固定在末端。马尾很长，可以起到驱赶蚊虻的作用。另一端有个环儿，可以套在手指上拎着走。^②

“结织蝇拂子”中的“结织”二字应是指古代的某种编织方法，类似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再用黑白二色的马鬃毛编出锯齿、鳞纹、十字等图案，套在柄上。下面再织出一个网络式的东西，将马尾套进去，固定在末端。”因为“结织”二字是较为笼统，其具体指哪种编织形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由上可见，窆庸所献结织蝇拂子并不是一件特别珍贵的物品。

二、关于文书书写时间的判定

《窆庸献蝇拂子启》这件文书并无年代落款，题解中也未提及，其具体时间已经无法确知，但可以根据史籍和文书所反映的信息推测出文书书写的大概年代。首先，上文已分析出《窆庸献蝇拂子启》这件文书的原纸首先是被用来印佛经，然后被二次利用来书写文字的，根据题解中所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已经推定为金刻本，《窆庸献结织蝇拂子启》的书写是二次利用，所以可以初步得知这件文书书写时间的上限当为金或晚于金，金或元时可能性较大。其次，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文书书写年代的范围缩小。本件文书的主要内容涉及窆庸和国公、平章大人这两个人物，

^①（唐）李延寿《南史》卷45《陈显达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134页。

^② 郭雨桥《郭氏蒙古通》，作家出版社1999年，第342页。

以及一个敬献礼物名称,其中敬献礼物对于文书书写时间的考证帮助不大,现对文书中所见的两个人物作如下考释:

窦庸,笔者遍查正史典籍,皆未发现与其相关的记载。正史中虽无窦庸的记载,但是在其他几本关于论述契丹辽国国史院的设立和发展演变的书籍中却发现了有关窦庸的记载。这几本书记载窦庸所引用的材料是完全相同的,这则材料是:“辽景宗以后历代领监修国史衙的宰臣,据《辽史》可考者,主要有室防、韩德让(耶律隆运)、刘晟(刘慎行)、马保忠、耶律良、窦庸、王师儒、耶律阿恩、耶律白、耶律严等人。”^①国史院的设置始于宋,辽仿宋制而设。国史院的史职,设有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撰修、修国史、同修国史等官职。监修国史一职,在辽代都是由枢密使兼领(唐宋以宰相监领之),以监督撰修本朝历史,故谓监修国史。上文根据此件文书利用形式的先后顺序,已考证出《窦庸献蝇拂子启》的书写年代当为金或晚于金,所以可以推定出文书中的窦庸和作为辽代监修国史的窦庸,此二人生活在不同的朝代,同名但绝非同一人。窦景庸《辽史》有传,《辽史》卷97,列传第27《窦景庸传》载:“窦景庸,中京人,中书令振之子。聪敏好学。清宁中,第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少府少监。咸雍六年,授枢密直学士,寻知汉人行宫副部署事。大安初,迁南院枢密副使,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赐同德功臣,封陈国公。有疾,表请致仕;不从,加太子太保,授武定军节度使。审决冤滞,轻重得宜,以狱空闻。七年,拜中京留守。九年(1094年)薨,谥曰肃宪。子瑜,三司副使。”^②从《辽史》中窦景庸的记载,可知此人和上文所说作为辽代监修国史的窦庸二人生存年代、官职完全匹配,应该是同一个人。之所以后人著书所引关于辽代监修国史的窦庸和《辽史》传记中所载的窦景庸二者名字相差一个“景”字,当为后人著书引用材料时漏写或略写其名称的缘故。从文书中所使用的“伏乞”、“钧座”等词语和书写语气来看,此件文书当为官场中官员之间往来的文书形式。所以,虽然此件文书中的窦庸未能确定下来,但从已有信息中我们可知窦庸是一个生活年代为金或晚于金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员。

关于国公、平章大人一职,实为此件文书书写时间判定的关键点。国公指的是爵名,平章指的是官名。笔者通过查阅相关的资料,发现像文书中这样将爵名国公和官名平章连用的记载屈指可数,多见于元代的史籍中。例如:《山右石刻丛编》卷30《五龙祠诗碣》,“李孟,皇庆二年(1313年)归国公印前,故称曰秦国公、平章政事。”^③《元书》卷10《泰定帝本纪第十》泰定二年(1325年)二月乙酉:“封阿里迷失为和国公、平章政事,张珪为蔡国公。”^④《续资治通鉴》卷220《元纪三十八》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庚申,以杨诚、陈秉直并为国公、平章政事。”^⑤《元史》卷47《顺帝十》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秋七月癸酉:“秦国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琐住等军,东西布列,乘机扫殄。”^⑥《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07《异姓封爵》:“许国公,关保,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十月,以平章内史封秦国公、平章、知院温普,人名见至正二十八年,余无可考。”^⑦以上这些记载“国公、平章”的材料,时间都在元代时期,并且多存于元末至正年间,这就说明了此官职存在时间的特殊性。通过史籍中这一官职存在时间的反映,我们不难推测出俄藏TK261V号《窦庸献蝇拂子启》这件文书的书写时间和官职的存在时间应该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件文书很有可能是书写于元代年间的。而关于平章一职的相关记载,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判定此件文书的书写时间为元代是无疑的。因为平章一职,在不同时期虽然职能大体相同,但其称谓却不尽相同,也可以说是各个时期都有其特定

① 包括:冯天瑜、林干总、穆鸿利《松辽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06页。陈述《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8页。曹之著《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5页。吴永贵《中国出版史·上册·古代卷》,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

② 《辽史》卷97《窦景庸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09页。

③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30《五龙祠诗碣》,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99页。

④ (清)曾廉《元书》卷10《泰定帝本纪第十》,层漪堂,宣统3年(1911),第70页。

⑤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220,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942页。

⑥ 《元史》卷47《顺帝十》,中华书局1976年,第985页。

⑦ (清)乾隆十二年敕撰《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07《异姓封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75年(1986年),第3357页。

的称谓。如唐代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宋因之；金元有平章政事；元代之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则为地方高级长官，简称平章；明初仍沿袭，不久即废。以上应注意的一点是，元代之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为地方高级长官，简称平章。如《元史》卷 91 志第 41 上《百官七》：“行中书省凡十，秩从一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每省丞相一员，从一品；平章二员，从一品；右丞一员，左丞一员，正二品。”^①又如，《元史》卷 13《本纪第十三·世祖十》载：“江浙行省平章忙忽带进真珠百斤。”^②以上对元代行中书省所设平章一职的分析，恰与《窦庸献蝇拂子启》这件文书中出现的平章一职相合，因此可以推断二者应是一致的，这就排除了文书书写年代为金代的可能性，可以判定文书的书写时间当为元代。

关于本件文书书写时间的判定，另外还有两点可以佐证：其一，在元代，各级官员指示命令的称谓有严格的规定：皇帝的指示称为圣旨；皇太子、诸王的指示称为令旨；行中书省官员的指示称为钧旨；路级总管府的最高官员达鲁花赤和总管的指示称为台旨。此件文书录文第 4 行出现的“钧座”二字，可见是专指对行中书省的，而行中书省又是元行所特有的政区划名。其二，从这件文书的出土地点看，TK261V 号文书《窦庸献蝇拂子启》出土于黑水城，黑水城是元代河西走廊通往岭北行省的驿站要道。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元朝在黑城置亦集乃路，并建总管府，隶属甘肃行中书省。20 世纪初，黑水城地区随着外国“探险者”的到来，发掘了大量的文书，这些文书大部分为宋、西夏、金、元时期的珍贵刊本和写本。其中有大量有关元代甘肃行中书省亦集乃路的文书，当然，据此并不能说明文书中的国公、平章大人就是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的官员，但从文书的出土地点黑水城以及黑水城在元代的重要地位看，也有助于此件文书书写时间为元代的判定。

三、关于文书的性质及其史料价值

首先，俄藏 TK261V 号《窦庸献蝇拂子启》是作为金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的背面所写，《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 册《附录·叙录》对《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的题解为：

金刻本。经摺装。白楮纸。共 1 面。上部被裁去。残高 12.9，面宽 9.7。地脚 3.2。面 9 行，行存 11 字。下单边。宋体，墨色中。首尾缺。

此件文书的刊刻年代和纸质与《俄藏黑水城文献》收录的其他若干件《大方广佛华严经》文书相比较为特殊，独此一件为金刻本，白楮纸。《俄藏黑水城文献》所收的其他若干件《大方广佛华严经》文书，都是西夏文刻本，未染麻纸。《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当中共收有西夏刻《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16 件，大多为未染麻纸，也包括黄楮纸、白麻纸和未染楮纸。通过比较可知，TK261 号文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为金刻本的刊刻时间和白楮纸的纸质都是非常特别和可贵的。

其次，《窦庸献蝇拂子启》这件文书形制特殊，四边整齐且内容完整，上文已经论证出该文书是在书写时被工具整齐的从佛经上裁切下来的。文书纸张首先被用来印佛经即《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裁切后被二次利用手书文字的。这是此件文书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因为它不同于以往的同为重复利用的公文纸印本。公文纸印本是指古人利用官府废弃公文和私人书启等旧纸纸背进行印书，公文的书写是一次利用，而刻书则是二次利用。此种印书之风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一直延续到元明，逐渐减少。《俄藏黑水城文献》其他文书的利用形式也多为先书写公文，再二次利用来刊印刻本。所以，像《窦庸献蝇拂子启》这件文书的利用形式比较罕见，与众不同。

^①《元史》卷 91《百官志七》，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2305 页。

^②《元史》卷 13《元世祖本纪第十》，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263 页。

最后，关于此件文书的书写格式。《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6 册的题解中编者将其定名为《窦庸献蝇拂子启》，即是将文书的性质定为启。启，原是魏晋时臣属向国君奏事的文书。启主要用于“陈政言事”、“让爵谢恩”，后人沿用此体，多以下对上，表示恭敬。启多为骈体文，句式两两相对，平仄相反，以四言、六言为主，形式较为板滞，多为应酬文字。启的格式，首书发信人“某启”，末署名或有或无，例如：“某启…不任恳切忧惶之至，不宣，某再拜”、“某启…伏惟以道以寿，下情不任惓惓之至”。宋元明清皆有启，元代也多沿用两宋书启格式。上文已考证出本件文书的书写时间为元代，所以本件文书若为元代的启，其格式也应该一致。但本件文书中并没有出现启所特有“某启”等专用词语，且文书形制短小，内容简单，亦无四六对仗的骈体文句式，因此可知本件文书并不是启的格式。所以，笔者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编者将其定名为《窦庸献蝇拂子启》并不是太准确。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进一步得知这件文书是窦庸为向其所在地的长官——某行省的国公、平章大人敬献蝇拂子这一礼物而书写的文书，反映了当时官员之间在交往中馈赠礼物的情况。可见这件文书是用于私人之间往来的文书形式，并非正式的公文。从形式和内容看也不同手书、札子等书仪形式。笔者发现，这件文书的书写格式与南宋绍兴初年一种名为“单纸”的书仪形式比较相似。单纸又称便条，即文字简短的字条，用于直陈所请之事，只写明简单事项。流传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从形状偏小和文字简短来看，本件文书非常符合便条的这两个特征，但其性质却并非便条。因为便条是用于直述所请之事，肯定要涉及一些包含具体事项的内容，如询问、留言、委托和通知等，这就要求有关时间、地点、缘由、人物等内容都必须写明确。然而，此件文书并不包含以上内容，只是反映了官场中官员交往时馈赠礼物的情况，所以可以判定此件文书的书写格式并非便条。本文第一部分已指出此件文书有三个特征：一是形状短小，二是内容完整，三是具有其特定的书写格式。文书的文字多集中在右下角和中间部分，字体宽松，行距较大，排列规则，左右两边有很大的空白区域。通过此件文书的这些特征，笔者认为它的书写格式非常类似于我们现在使用的“礼单”。礼单，或称礼帖，即载明礼物的帖单。关于礼帖的格式，对其记载较早的可参看朱翊新编《大众应用文件集成》一书^①：

(1) 批书送礼礼单式

件	玉	件	金	件	古
器		物		玩	
×		×		×	

(2) 送礼名片式

敬		
谨具	某物×件	姓名
申		

TK261V 号文书的书写时间上文已考证出当为元代，有关元代时期与这件文书书写格式相关的记载笔者尚未见及，朱翊新先生《大众应用文件集成》一书虽然为民国时期著作，与文书书写时间较为久远，但此书有关礼单格式的记载，对于我们判定本件文书的性质具有较强的提示作用。因为尽管随着时间的推进，礼单的书写格式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但不管其日后如何变化，总会保留些许礼单书写格式所特有的最初特征。以上朱翊新先生一书中所载的这两封送礼文件，一封是批书送礼礼单式礼帖，另一封是送礼名片式礼帖。从形式和内容看，很明显第二封送礼名片式礼帖与本件文书更为相似。第一封批书送礼礼单式是多项礼品的赠送，第二封送礼名片式是单项礼品的赠送。将送礼名片式礼帖上的文字和 TK261V 号文书对比，可见“某物×件”与文书中“蝇拂子一把”对应；“姓名”处与文书中送礼人“窦庸”对应；“申敬”与文书中“伏乞”、“笑留为妙”对应，同为敬语。综上所述，可见此件

① 朱翊新《大众应用文件集成》，世界书局 1936 年，第 8 页

文书的性质应为一个礼帖，而编者将其定名为《窦庸献蝇拂子启》实为不妥，参考上文对文书时间的考证，将其定名为《元窦庸献结织蝇拂子礼帖》，应该较为准确。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此件文书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第五之二》这件文书的背面写本，文书是用于官员间馈赠礼物时所写的礼帖，那为何会写在已经用过的纸张背面，这样岂不是不太正式和礼貌？笔者认为此件文书写于已经用过的纸张背面，极为可能是一张草稿，先练习书写一下，并非正式的礼帖。至于为何写在一张佛经背面，笔者推测应为书写者就近取物、随手用之。判定了文书的性质后，也就发现了这件文书的另一个珍贵之处，就是提供了元代时期官员私人之间交往，用于赠送礼物时所书写的礼帖这一书仪格式的实物原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通讯地址：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石家庄 050024）